

西方修辞学视域下的受众解读

姚喜明, 王惠敏

(上海大学 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0444)

摘要:对受众的考察从来都是西方修辞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早期的受众研究一直没有挣脱信息的单向线性传播模式,只是到了19世纪以后,多元、复杂的受众观才逐渐浮现。多维的受众取代了单一的受众,被动的受众让位于主动的受众,从而使传统的受众概念经受了全新的重构。传统的观点把受众当作是话语试图统辖的对象,而后现代主义则把受众看作是参与修辞话语的构建者,基于此,言者和受众的界限不断淡化,受众开始消解。

关键词:西方修辞学;受众;主体

中图分类号: H3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24(2010)01-0035-05

一、引言

西方修辞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视受众(audience)为修辞术的三要义之一。^①此后这门学科的发展虽历经沉浮,然其对受众的关注则始终如一。由于现代西方修辞学的跨学科性,受众的内涵变得更加复杂,更加难以把握。受众已不再是单纯的信息接收者,他们影响、建构并生成信息。“当前的情况是,不管是在人文学科还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受众一词所指的对象正在消解”。^{[1](103)}受众所指代的这个错综复杂的实体并非我们所想当然的那样简单清晰,它已经超越了时空的限制,幻化成一个瞬息万变的集合,遁隐了清晰的边界。本文试图廓清西方修辞视域下受众研究的面貌,勾勒受众的多维面相,分析受传关系,并进而呈现受众内涵的演化历程。

二、受众研究的三个阶段

传统的受众观发源于古希腊,此后一直到19世纪末期,受众基本上都是指任何体验话语或文本的个人或群体。此处“体验”的外延已经囊括了听、读、看等感知行为。亚氏甚至通过区分不同受众的情感,把受众按照社会变量来分类等帮助演说者把握受众。演说者着眼的都是如何适应受众。一直到18世纪后期,乔治·坎贝尔

(George Campbell)借鉴心理学的理论成果把分析受众研究推向了新的深度。他认为演说者应诉诸受众的四种智力,即理解、想象、记忆和情感。^{[2](187-188)}这种心理学方式不以受众而以大脑功能为对象,预设人们所知、所感、所思的齐一性。这就导致了两种后果:一是作为个体的受众被忽视,受众退化为可控制的群体;二是催生了对“普遍”受众的探寻,为受众研究增添了“科学”色彩。^{[3](475)}

新修辞学的兴起则把受众研究推向第二个发展阶段。其代表人物之一劳埃德·比彻尔(Lloyd Bitzer)复活了修辞情景,认为其中的修辞受众不是一般的听者或读者,而是能够受语篇的影响且能够作为变化的介体的人。另一代表人物钱姆·佩雷尔曼(Chaim Perelman)提出的“普遍受众”概念则在承继前人思想的同时加载了道德的负荷。他的“特定受众”(现实的个体)对应“普遍受众”并以这种非真实的理想化的受众类型为参照,认为凡是能够迎合该类群的诉诸即为好的论辩反之则为糟糕的。“特定受众”的提出弥补了传统受众研究重整整合轻差异的弊端。倘若说佩氏的受众观浸润和丰富了干涸已久的传统受众研究,那么新修辞学领军人物肯尼

收稿日期:2009-04-18

第一作者简介:姚喜明(1965-),男,河南中牟人,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

①亚氏认为,言者、话题和听者共同构成修辞行为,其中听者是修辞行为的目的所在。

斯·伯克(Kenneth Burke)对受众的观察则动摇了人们秉持已久的观念。在伯克看来,“成功的劝说在于使用被劝说者的言语方式,它包括话语、姿态、声调、规范、意象、态度、思想等方面”。^{[4](55)}可见,劝说的过程中修辞者做出了改变,最终与受众达成认同(identification)。^①据此可知,受众不仅影响修辞者的策略而且帮助修辞者构建修辞的内容。受众研究已不再囿于从言者到受者的单维线路,转而关注二者的双向互构。

伯克的观点指引了一条多维化的受众研究道路,那么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澎湃则颠覆了传统的受众观,使受众的概念更加复杂化了。后结构主义不但挑战传统的语言观,而且对受众研究向深层次发展也发出了召唤,认为知识不在语言之外而在语言之中,这同把修辞学视作产生真理而非传递真理的过程的观点殊途同归。“真理是由社团的话语实践决定的”,^{[5](73)}福柯如是说;波特(James Porter)则感慨道,近年来受众理论最有意义的发展“非话语社团(discourse community)对受众的重构莫属”。^{[6](44)}我们每个人都隶属于至少一个话语社团,被定位在话语结构中,任何意义的构建都源自社团内部。由此,修辞者所运用的话语资源并非原创,而是借自不同社团,在与个人经验和背景碰撞的过程中形成了修辞构想。而这些修辞构想只有被受众接受,被其阐释,意义才会呈现。阐释可以是合作的,即遵循修辞者既定的目标来理解,也可以是抵抗的,与修辞者的构想背道而驰。然而更多时候阐释是协商性的,不完全接受也不全然排斥修辞者的预想。这样,从意义生产的角度,传者和受者的界限已不再明晰。“这种视角的转变不仅仅意味着发现了积极‘生产’意义的受众,而是把受众纳入到了主体间传播关系之中,揭示了阐释过程所隐含的社会经济关系”。^{[7](18)}这种受众观把人、语言和环境从根本上连接起来,从而把受众置于一个更广阔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中,更多地转向对主位受众的关注。

三、解读受众

(一)受众的多维面相

根据上面的分析,受众演变的复杂性和内涵的多变性使得没有一种区分方法可以恰如其分

地呈现其多维面相。但是,在貌似繁复的情形中,我们仍然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有意义的探索。

比彻尔视情急状态,受众和限制项为动态修辞情景不可缺少的成分。起初,“情景还没有完全发展或成熟,讯息尚不能充分地支配限制项以影响受众去改变情急状态”。^{[8](34)}这时的受众仅是潜在受众。以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发表的演说“I Have A Dream”为例,当时遭受种族歧视和迫害的黑人公众对将要爆发的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并没有先知先觉,而是有待于演讲者唤醒他们对这一状态的注意并强化他们与这种缺陷状态的利益关系。金的演讲唤醒了长期以来被压迫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意识,激发了他们的行动。在此过程中,受众关注这个修辞情景,乐于接受语篇,愿意促成变化。最终演讲者期望的目标得以实现,情急状态得以改变(美国国会通过了《民权法案》)。这样修辞情景淡出,修辞过程终止。这时的受众便是积极的受众。另一个结果是修辞主体没有能够抓住时机,致使修辞情景开始恶化,受众态度趋于僵化,兴趣开始减弱并转移到其他更紧迫的事情上去,这时的受众便是消极的受众。最后修辞情景逐渐瓦解,“不再有受众,不再有限制项,信息手段已经无法改变情急状态”。^{[8](35)}

尽管这样的分析并非无懈可击,却为我们提供了动态考察受众的新视角。另一种较有启发意义的探索来自邓肯(Duncan)的受众分类,他借用语言系统中的人称称谓“they”、“we”、“you”、“me”和“ideal audience”来呈现受众的多种社会角色,通过分析他们之间的关系,人类社会的等级性和修辞性得以显现。^{[9](69-70)}

下面我们用奥巴马的题为“We the people, in order to form a more perfect union”^[10]的演讲来说明邓肯的理论。奥巴马以追溯历史开篇,两百多年前先辈们为躲避暴政和迫害,逃离旧世界,到美利坚合众国建立新世界,试图倡导和推行自由和平等的社会理念。然而时至今日,自由和平等依然遭到践踏,而他以及他所代表的民主党正在致力于营造一个不分党派、肤色的新美国。这样诉求对象从曾经为自由而来的“they”转向保卫自由的“we”,既肯定了大众所秉持的“天赋人权”

①伯克认为认同不等同于劝说,认同还包含无意识的动机,劝说则是目的明确的设计。

的观点,同时也迎合了他所在利益集团的对外形象。“肯尼亚的黑人父亲和堪萨斯的白人母亲共同给予了我生命”。随后通过诉诸自我“me”的特殊经历,奥巴马期望能够同“you”,即赞同放弃肤色歧视的选民受众取得认同,最后依循惯例他还要让人们知道这种新美国人“ideal audience”的根源其实就是最原始的美国梦。在这里,受众扮演了多种社会角色,拥有多重目的,身份缺乏稳定性,或内在或外在,或显性或隐性地参与了修辞者的修辞构建。

(二) 传者和受者的上下位关系

“Audience”(受众)一词源自拉丁语“audire”,意为“倾听”。倾听意味着完全忘掉自我。唯有如此,才能通达神的殿堂——这是西方宗教的一个共识。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你可以闭目不见,却难以塞耳不听”。可见,受众一词的被动意味由来已久。最早的受众可追溯至古希腊聚集在城邦内倾听演讲和观看演出的民众。他们卑微、无言、乏力,被精于辞令的修辞者握控于股掌之中。偶有意见相左者,也被视为是言者修辞策略不当所致而非受众自主意识的觉醒。传者主导修辞过程好似天经地义,不容置疑。

后来这样的观点进一步发展,有人提出受众从来不是绝对被动的,而是有一定主动性和选择自由的。这种观点为“天赋人权”等观点做了铺垫。但是,作为“天赋人权”的选择自由虽无可厚非,然其在修辞者的“恩威并施”下就好像风中摇曳的蜡烛。上文提到“认同”就是像受众那样所言、所思、所感、所行。进一步推敲,我们发现这样的改变系修辞者主动为之且多数情况下仅是“逢场作戏”,背后隐藏着这样或那样的动机。在这个貌似平等互动的过程中,修辞者始终处于上位,至多只是小试了“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策略。而我们所熟知的修辞三诉求(理性、人品和情感)则扮演了“大棒”的角色,“任何受众成员在其表达异议之前都不得有所顾忌,担心自己是否真的不明事理、思维失常、违反人性或者会被别人看成这样”。^{[111](112-114)}也有学者提出了辩证式(dialectic)的受传模式。如古希腊的哲辩师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认为,同一问题基于受众的两个对立的观点经过相互

作用可以生成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121](7)}现在让我们来看福格蒂(Fogarty)的一段话“……好像伯克自己是由五六人组成的讨论小组,依次担当所有的言说角色,直到他筛选出最满意的观点表达式”。^{[131](61)}原来,上至普罗塔哥拉下至伯克所谓的辩论只不过是修辞者构思时的假象模式,仅存在于修辞者和修辞者之间,而不是修辞者和受众思想的真实博弈。可见,上述试图平衡受传关系的说辞亦是有形无实,我们看到的是修辞者对受众的残酷统治。

今天,也许更多的人不知道在14世纪,当“audience”成为英语词汇大家庭的一员时还伴生了另一个意义,“听证会”。通常,法官和陪审员是听证会的典型受众,辩护双方的诉诸对象。他们有权对被告做出裁决,选择支持辩护的某一方。从这个意义上说,受众甚至处于上位,因为他们不但拥有选择的权利更有做出仲裁的权力。现实中同时拥有权力(利)且处于上位的受众并不鲜见。上文提到,奥巴马发表竞选演讲时要迎合他所代表的民主党派受众,因为他们享有选择或罢黜候选人的权力(利),如果奥巴马违背了他们的意愿,必定会被取消候选人的资格,剥夺发言的权利。可见,奥巴马只是他们的一个辩艺优秀的代言人,演说时只能遵循他们的意志,当选后也只能服务于他们的利益。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彼得斯(Euripides)曾有言,“无法说出自己思想的人,即是奴隶。”这个例子中言者奥巴马显然处于下位。

如果上述两例的受众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那么让我们回顾一下刚刚尘埃落定的“华南虎事件”中的受众。在这个事件中,受众分布广泛且人数众多,甚至在汉语言语社团之外,也有受众在关注该事件的进展。在此之前的许多年里,人们认为野生华南虎已经不复存在,而“虎照”的发布则“干扰”了公众的正常认知,更为糟糕的是,公众一眼便看出,与“虎照”相联系的还有直接的经济利益,这不能不引起公众的警觉,激起公众对“虎照”真伪的质疑。这些受众的反应对整个事件的发展变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使得政府有关部门不得不承诺对“虎照”进行再次鉴定,不得不就草率发布消息而道歉。而把“存在野生华南虎”这一引起争议的“事实”引入公众

视野是通过具有高度可信性的“新闻发布会”这一形式实施的,而受众的这些质疑和批判却对发布这一信息的政府部门构成了挑战,迫使他们认真检视自己的言行,采取更为审慎的态度,更加客观公正地处理公共事件。由此可见,受众权力(利)之大。

后现代主义把修辞者和修辞对象置于主体间的框架内来考察,因而受传二者无所谓孰上孰下,他们都是修辞过程的参与者。但是,在后现代主义者林林总总的言论和著作中我们依稀可以窥见他们力求持稳的天枰还是倾向了阐释者即受众一方。毋庸置疑,即便是当代,传者上位的观点在很大范围内仍是主流思潮,且根深蒂固。这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有言者必有权)和认知根源(先入为主和从前到后的认知取向)。

(三) 受众概念的消解

后现代主义视受众为参与交流的主体,而主体作为西方近代思想的产物起步于笛卡尔。一句“我思故我在”宣告理性成为构筑主体唯一的必要条件,人类俨然成了一个自由、自主、自治的主体。然而“理性本身是世界上最成问题,最含混不清的东西之一”,^{[14] (14)}又如何作为判断通达真理和智慧的终极权威?福柯“斥责”笛卡尔拒绝怀疑理性本身,并在借鉴现象学、精神分析学和结构主义等理论的基础上,开展了他对主体的认识。福柯认为,主体是话语、机制和权力及其关系的产物,并受制于这一关系网络,同时主体仍然可以相机而动积极制作和完善自己的身份。在这个新的解读框架内,修辞者和修辞对象可以被看成是修辞话语创造的两个主体位置,等待着言者及其受众去占领。依据修辞情景的变化他们也将持续不断地再制作和再完善自身的主位角色。正是把受众作为主体看待,才有了对受众本质性问题的追问。

通过考察萨特(Jean-Paul Sartre)的存在主义哲学(existential philosophy),福柯认为可以推知一个结论即“所有的真理都来源于人类主体对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事件——包括他们自身对社会的参与——的思考和理解能力”。^{[15] (6)}通过考古学的方法福柯还原了人类认知的历程,证明了这一观点的现世存在,然后对这一观点发出诘难。文艺复兴时期,人们通过寻找事物之间的相

似性来认识事物,语言不是认知工具而是自然秩序中词语及其所指的固化模式。古典时期,人们发现词语及其所指是非对称的,所谓的现实其实是语言的现实,语言被看作是分析和编排知识的工具。现代,语言被视为一种历史现象,它不再具有任何认知特权。发展到现世,主体“凌驾”于语言之上被奉为认知的上位,而理解成为主体的存在方式,且每一个理解总是之前境域和现在境域的攀谈。^{[16] (198-200)}福柯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这样的阐释忽略了语言对主体本性的提示,只会陷入笛卡尔式的形而上学的幻梦。他试图把主体从任何“存在”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宣称人可能已经离末日不远了。这意味着主体这个概念的消解而非人这个物种的消亡。主体不能先于社会秩序而存在,比如各个领域内职位先于占据这些职位的人存在,当主体各就其位后,他们的主体性也开始被该领域的运作所塑造。主体也不是意义的源泉,主体被定位在话语结构中,任何意义的构建都源自主体所在的话语社团,主体本身即是话语的产物。对作为整体的语言系统福柯并不感兴趣,他关注的是语言的个体行为即话语。“话语可以理解为行动中的语言:它们是一扇扇窗户。只要你愿意,就能通过这些窗户理解事物,‘看见’事物。这些话语窗户造就了我们对自我的理解,和我们赖以判断价值、真假和正误的能力”。^{[15] (36-39)}可见,这一认知过程中,主体隐退,只有语言在言说。

综上所述,受众概念的消解首先是指后现代主义的主体间概念模糊了言者和受众的清晰界线。按照“说话”和“受话”这一表面现象划分两者已难以把握角色的内在不稳定性和复杂性,而把两者纳入主体间框架则破除了两者的对立。其次,福柯关于主体死亡的著名论断意味着受众作为积极的意义生产者这一认识将被受众只不过是话语的产物这一观点所取代。

四、结语

可见,在一个主体间的受传关系中,传统的受众概念遭到弃置。福柯等后现代主义者虽意不在修辞学领域,但是他们对人、语言和言语社团的思考却深化了我们的修辞认识,正所谓理论融合的过程也是发现新的理论盲点的过程。以上论述也提醒我们在复杂多变的修辞关系中应敏感

洞察外界因素并灵活掌握自身角色。倾听意味着劝说的开始, 这样修辞者不一定是言者, 而言者远非受众的“上司”。

参考文献

- [1] BIOCCA F A. The Breakdown of the Audience[C]// ANDERSON J. Communication Yearbook: Vol. II. Newbury Park, CA: Sage, 1998:127-132.
- [2] CAMPBELL G. 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M]. London: printed for W. Strahan and T. Cadell and W. Creech at Edinburgh, 1776.
- [3] 胡曙中. 美国新修辞学研究[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 [4] BURKE K. A Rhetoric of Motive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 [5] FOUCAULT M. The Foucault Reader[M]. Paul Rabinow ed: Penguin Harmondsworth, 1984.
- [6] PORTER J. Audience[C]//ENOS T. Encyclopedia of Rhetoric and Composition. New York: Gerland Publishing, Inc, 1996: 37-44.
- [7] 单波. 译者序[C]//罗杰·狄金森, 等. 受众研究读本. 单波,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6:1-21.
- [8] BITZER L. Functional Communication: A Situational Perspective [C]//EUGENE E W. Rhetoric in Transition: Studies in the Nature and Uses of Rhetoric. University Park: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0:21-38.
- [9] JASINSKI J. Sourcebook on Rhetoric: Key Concepts in Contemporary Rhetorical Studies[M].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2001.
- [10] OBAMA B. We the People in order to Form a More Perfect Union [EB/OL]. (2008-03-18) [2009-02-14] http://www.tamilnation.org/intframe/us_presidential_election_2008/080318obama.htm.
- [11] 刘亚猛. 追求象征的力量——关于西方修辞思想的思考[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4.
- [12] CONLEY T. Rhetoric in European Tradition[M]. New York: Longman, 1990.
- [13] FOGARTY D. Roots for A New Rhetoric[M]. New York: Russell and Russell, 1968.
- [14] 恩斯特·卡西尔. 人论[M]. 甘阳,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 [15] 丹纳赫. 理解福柯[M]. 刘瑾, 译.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 [16] COVINO W, JOLLIFFE D. Rhetoric: Concepts, Definitions, Boundaries [M].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95.

Audience Interpretation in Western Rhetoric

YAO Xi-ming, WANG Hui-m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on audience has been one of the central issues in the Western rhetoric. The early studies had been fettered by the mono-directional pattern of information distribution and only by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did the view of diversified and complicated audience appear. A multi-faceted audience was substituted for unitary audience, and the passive audience gave way to the active audience. Thus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audience has undergone a total reconstruction. The audience is no longer considered as the object to be controlled but rather as the participan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hetorical discourses in line with postmodernism. Hence,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rhetor and the audience is fading, with the audience gradually being absent.

Key Words: Western rhetoric; audience; subject

(责任编辑 王抒)